

编码与解码:党史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建构

赵 月

[摘 要]党史文化作为一种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百年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思想符号、历史符号。党史文化符号的产生、传播、应用过程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共生同构,在“编码者”与“解码者”从符号编码、符号传播到符号解码的双向互动中得到发展与完善。这一过程同时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史文化符号的编码者、阐释者,在表意过程中克服阐释漩涡与评价漩涡,并为解码者提供能够产生交集与认同的元语言体系,推动两者在党史文化这一平台上进行有效互动,进而把握党史文化的符号话语权,在文化符号领域深入推进党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关键词]党史文化符号;编码;解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ZD007)

[中图分类号]G122;D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24)06-0026-10

doi: 10.20089/j.cnki.issn.1009-105x.2024.06.003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基因,文化思想则是关于文化建设实践活动的规律性认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高度凝练和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在文化主体性自觉、自信的基础上为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运行逻辑增强了系统性要素,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党史文化作为“党的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表现形态”^①,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百年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思想符号、历史符号。文化符号的产生、传播与应用,是一个“编码”与“解码”的过程,“符号在推动文化表达交流的基础上带来文明”^②。党史文化符号在“编码者”(即中国共产党)与“解码者”(即人民大众)的双向互动中得到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携带特定的符号意义,具有记忆、沟通和凝聚等功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曲折过程,并成为塑造意识形态进而构建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标识性话语的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象征形式。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党史文化已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些研究为采用多

① 欧阳淞:《关于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9期,第6页。

② 青觉、徐欣顺:《论中华文化符号的概念、要素与边界》,《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05页。

学科的视角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具有多维面相,经典阅读史、记忆建构史、文化符号史、形象构建史、政党文化史,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有待拓展的空间”^①,在诸多理论问题的交织中,意识形态的意义生产与话语体系的构建往往深藏不露。因此,从符号学的视角考察文化符号在具体语境中产生以及话语体系在符号演绎中变迁的过程尤为重要,这一考察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党史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建构之间互为论证的关系,即党史文化符号在“编码”“传播”到“解码”的过程中如何进行符号意义的传递,从而进行话语体系的建构。

一、编码:在话语体系的生产过程中把握党史文化的符号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既是党史文化的实践者、倡导者、发展者,也是党史文化符号的编码者、阐释者、生产者。“没有符号,也就没有意识形态的建构;放弃符号分析,也就意味放弃意识形态研究。”^②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需要形成具有政党元素的文化特质与品格,并以此进一步巩固与引领政党的发展。这种文化特质与品格包括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整套关于政治理论、政治人物、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理念的文化体系。通过构建党史文化“物质符号—制度符号—精神符号”的符号系统,能够把握党史文化的符号话语权,在文化符号领域深入推进党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从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以及话语权。

(一)党史文化符号及其象征

文化符号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文化产物,能够体现一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东方巨人’等就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符号,书写着中华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和价值情怀,成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价值编码。”^③而党史文化作为符号表意活动的集合,这一符号集合不仅包括思想活动,也包括带有意义的实践活动。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党史文化的意义通过党史文化符号呈现。实际上,将党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可以把承载与传播党史文化思想的符号载体分为物质符号载体、精神符号载体与制度符号载体。党史文化与符号载体之间相互关联,党史文化通过物质符号载体、精神符号载体和制度符号载体得以展现和传达,其意义为解码者所感知并产生价值,符号载体则借助党史文化的支撑而现实化和具象化。值得注意的是,党史文化中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的符号载体之间既相对独立,彼此间又相互交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有时能够相互转化。物质符号与制度符号作为精神符号的重要载体,而精神符号能够反作用于物质符号与制度符号,集中反映物质符号、制度符号中的党史文化思想,三者辩证统一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历史实践。

① 陈金龙:《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第5页。

② 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③ 邹广文:《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叙事结构》,《哲学研究》2021年第11期,第9页。

第一,物质符号载体,即以物质形态承载党史文化思想。

“在人类社会,每一种实用物,或有实用目的的行为,都有可能带上符号意义;反过来,每一种供使用的物,也可以变成符号载体。”^①党史文化的物质符号载体,即以物质形态承载党史文化思想,是党史文化的外在物质表现形式,具有直观的、易被参观的特点。党史文化的物质符号载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在重要历史时期中产生并依靠实体形态呈现出“物化”的党史文化。大体包括:(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早期党组织建立、中共领导下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等遗址遗迹,有上海石库门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早期领导人和党组织的活动遗址。(2)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与西柏坡留存下来的党史文化遗址,有沂蒙山革命根据地、《人民日报》创刊地、渡江战役纪念地等等。(3)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人民在各项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成就展示场馆,有安徽小岗村、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等等。还包括革命烈士的遗物故居、重要会议旧址、革命战争遗址遗迹、纪念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历史象征之所。二是记载、传播党史文化的文字、声音、象征媒介与其他物质形式。包括:(1)文字符号,是最常见的符号类型,包括各种党史基本著作、人物传记、档案文献等等。(2)声音符号,是指以人或器物发出的声音符号作品,包括革命歌曲、戏剧、红色歌谣,有《工农联合歌》《庐山之雪》《白毛女》等。(3)象征符号,包括旗帜徽章、领导人肖像、领袖雕塑、纪念碑等表达象征意义的符号作品。

第二,制度符号载体,即以制度优势保障党史文化发展。

党史文化的制度符号载体,即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孕育、形成、发展到完善的规章制度与体制机制,是具有规约性、引领性以及约束性的符号系统,包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制度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②。制度符号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发展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的运作效率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否占据制度优势地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探索并形成了由党的领导制度、代表大会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监督制度、选举制度以及其他具体工作制度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相互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制度符号系统内各要素间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完整性、层次性、协同性与有效性,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与作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这一元符号意义。

第三,精神符号载体,即以精神谱系构筑党史文化标识。

党史文化的精神符号载体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构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整体架构,承载党史文化思想的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9页。

一系列精神符号,具有抽象性、内在性的特点。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老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种子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三牛”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等。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构筑的精神谱系,一方面能够展现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战略重点以及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另一方面,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形成和凝练的具体精神样态能够彰显中国人民、中国精神以及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创新力,见证中国从百年沧桑到大国崛起的过程。

(二)党史文化符号中意识形态的自然化编织

党史文化的符号化过程是编码者通过观察、理解、体悟等方式,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念、话语规则,对党的百年历史实践中所承载党史文化思想的符号进行意义生产、解释、建构的过程,在表意上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党史文化符号的意义生成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召唤,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通过具体的符号表征进入传播领域,从而超越党史文化自身的历史具象。换言之,符号载体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排列集合,更为重要的是表达背后抽象的、表征的、再现的意识形态隐喻意义,而不是表象的、直观的、感性的载体本身。意识形态是党史文化符号的内核,而党史文化符号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第一,党史文化符号在“直指”“涵指”的横向流动性衍义中进行意识形态的自然化编织。

现代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能指”即符号的能喻,是指符号的可感知部分;“所指”即人类感受“能指”时所唤起的心理概念。两者并非同时产生,“能指”先于“所指”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呈现任意性、选择性的特征,一旦确定后就具有稳定性,不能随意变动。巴尔特将“能指”与“所指”联结为一体的过程称为“意指”,这一过程是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党史文化符号的“直指”只有一级符号系统,符号表意仅在一个层次内进行表达,是符号意指中最简单、最自然化的方式。以“五四”符号为例,在直指系统中,“五四”这一名称意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政治示威活动”这一客观对象或印象。而“涵指”在“直指”的基础上衍化出的二级符号意指系统,一级系统“直指”构成了“涵指”的“能指”,即“涵指项”。在“涵指”系统中,“五四”涵指着“民主”“科学”或“政治”“思潮”等。由于“时间距离规约了后‘五四’时代,任何解释都会存在差异”^①,“涵指”系统中的“所指”作为党史文化的产物,呈现为一种自然产物状貌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化政治认同、提升政治情感、构建政治共识的功能。

^① 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第二,党史文化符号依靠符号权力以一种自然幻象建立并推广统一的价值与规则符号体系。

党史文化符号象征着党的价值主张与政策表达的统一,在从“直指”到“涵指”的“意指”过程,依靠符号权力建立并推广统一的价值与规则符号体系,将符号意义展示为一种自然的而非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从而建构政党的合法性并凝聚社会成员。“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方式随着“意指”方式的衍化而变化,但其中的不变量或恒常量就是意识形态,具有一般性、完整性的特点。由于“直指”系统是初级系统,基于真实、客观呈现出简朴、如实的状态,而“涵指”以“直指”的“能指”作为基点,进一步剥夺和抽离“直指”系统中的语境、内容,以一种自然幻象掩盖扭曲、改变“直指”的“所指”的事实,以工具性、抽象性的概念而存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自然化掩盖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涵指”中“直指”这一初生系统的存在,“直指”中逼真的自然性使“所指”意义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于解码者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中,最终得到集体认同并成为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符号的意义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编码者依照符码对信息进行整合建构,将意义编制入符号文本而产生。编码者掌握着意识形态的原创权、阐述权与话语权,通过“能指”与“所指”不同的结合方式,实现其意识形态“意指”的根本目的,使符号意义中隐含的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正当化、合理化、自然化。

二、传播:在话语体系的开放过程陷入阐释漩涡与评价漩涡

党史文化符号的传播受参与主体之多、传播过程之复杂等因素影响,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上面临不少挑战。党史文化符号系统,包括发送者、信息、媒介、接受者、符码等诸多要素,编码一经完成,符号所携带的信息便进入一个多义的、开放的流通环节,符号意义的有效传达需要经过感知、接收、解释的过程。一方面,符号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解码者对意义解读的限制,符号阐释权不再仅仅掌握在编码者手中。另一方面,由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关系、地位的不对等,党史文化符号在话语体系的开放传播过程会陷入阐释漩涡与评价漩涡,即符号解读未必是正解、有效解,有时可能是误解,符号扭曲、符号误读以及符号暴力等现象时有发生。

(一)在试探性解码中陷入试探性“解构”的阐释漩涡

符码的集合,一般被称为元语言,符码是个别的,着眼于符号单元的解释,元语言是集合的,着眼于研究解释规律的问题。党史文化的符号文本属于弱编码,即发送者的编码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解释,不具有强制性。元语言能够实现每一个文本有相对应的解释意义,接受者“在符号与其象征功能之间不断实践互动,进行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①,拥有一定的符号阐释权、机动权。而表达权力泛化、意见领袖

^① 王军:《新媒体语境下重大主题仪式化传播的实现路径及其文化图景——以爱国主题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160页。

兴起,反映着符号解释权的争夺激烈,导致意识形态符号话语权被消解、权威性被解构、传播力被削弱。解释者不断调试元语言体系以求一解,由于正解是任何解释难以企及的理想,对于党史文化符号中的意义解读会存在偏解问题。

阐释漩涡,即在同一个或同一批阐释者的同一次阐释中,使用了不同的且相互冲突的元语言集合,导致同层次元语言冲突。文化符号中的弱编码导致对党史文化的解码容易产生不足解码与附加解码两个方面的阐释漩涡:不足解码,是指当阐释者不拥有关于党史文化文本既定符码的足够了解时,就只能从经验中抽取若干阐释片段组成临时的、假定的符码集合,以一定的“符码态度”对文本进行试探性解码。而附加解码,是指在既定符码基础上尝试加上另外一些符码。两者是阐释漩涡发生的同一件阐释事件的两个不同方面,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对党史文化的符号误读与符号扭曲,背离了党史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

由于每个阐释者的判断逻辑、评价标准以及经验事实不同,对于文本的试探性解码会朝着试探性“解构”的方向发展,一般从解构党史人物、党史事件等具体的党史文化符号入手,进而对承载符号的历史时段进行解构。一是对于党史人物的解构,即以“重新认识”为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领袖与英雄人物进行丑化、诋毁,仅仅抓住革命领袖与英雄人物的一点或某些局部事实,甚至有意挖掘负面材料,从经验过的类似活动中进行阐释,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博取眼球,从而达到重新看待党史人物背后的历史事件的目的。二是对于党史事件的解构,即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以所谓“考证”“还原”虚无党史。一般表现为有意遮蔽部分党史片段、凸显某些党史片段、重新阐释党史发生过程,以所谓人之常识污蔑特定党史事件与情境中的人物的超常行为,或以现今的标准评判党史事件,实际上是变相贬低与否定。

党史文化符号的传播是新时代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扩大意识形态工作舆论阵地的重要途径,而主流意识形态目前在阐释漩涡中面临着符号话语权的消解、符号话语力的削弱等困境。第一,符号阐释权力泛化,意识形态话语权被消解。党史文化符号的解读无法进行自我阐释,不具备完整性与自洽性,需要以元语言进行解读。党史文化符号信息的发出与传达过程中,解释意义必须不在场,才能保证符号信息流向解释。由于符号意义的不在场,部分符号阐释权力转移给民间传播主体。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与成本,技术赋权使公众获得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的权力,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信息的主动生产者与发布者,中国共产党作为编码者担任“把关人”角色的难度加大,客观上形成了社会文化传播主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争夺话语阐释权的势态。第二,社会思潮符号交锋,意识形态话语力被削弱。“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等象征符号,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认为西方意识形态是超越阶级、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人类文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全球化的助推下影响广泛,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象征符号。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虚构历史、胡编乱造,将历史人物

与历史事件丑化、娱乐化、妖魔化。这些社会思潮的相互碰撞,从深层次上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与国家意识形态空间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容易造成社会群体的分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力的削弱。

(二)在元语言集合冲突的全球化浪潮中陷入评价漩涡

“意识形态即文化的元语言,它是文化活动的评价体系。”^①符号的解释必须依赖元语言,文化的评价必须依赖元元语言。“不同的元语言应当位于不同层次上,但是各种元语言因素构成的不同集合,也可以在同一层次上的同一个阐释行为中起作用,这时候它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冲突,形成阐释漩涡:此时两种相反的意义并不相互取消,反而共同起作用,创造一个阐释漩涡。当这种阐释漩涡发生在元元语言层次上,可以称为评价漩涡,或意识形态漩涡。”^②因此,元语言集合发生的冲突被称之为阐释漩涡,而更高层次的阐释漩涡,即元元语言冲突,可以称为评价漩涡。同一意识形态或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不同主体对于党史文化符号进行评价时,难免出现评价冲突,评价漩涡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意识形态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应辩证地看待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中的作用。

评价体系的冲突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冲突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冲突与和谐在党史文化的评价漩涡中相互依存,成为推动社会进程的基本动力。对文化进行评价的主体,往往以集团的形式存在,这些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或同一意识形态下不同集团之间现实利益的冲突造成评论双方保持对立与制衡,从而避免了因一方评价力量的绝对强大而造成社会的巨大伤害。实际上,危与机是辩证的统一体,评价漩涡内部各因素、各主体越是相互冲突、相互矛盾,越是能够演化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化解危机、抓住机遇,善于运用评价漩涡内化冲突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会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以及王稼祥等人作了重要发言,主要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方:一方是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另一方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围剿”路线。两方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战线方针存在冲突与对立。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评价体系,与基于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体系之间的交锋。正是在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一生死存亡关头,两方在军事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内化评价漩涡,减少运作阻碍,最终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全球化浪潮、多元文化意味着党史文化的评价漩涡的规模不断扩大,只有摒弃单一评价体系,才能利用好评价漩涡,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优势。意识形态的传统建构倾向于元语言的单一化以增强意识形态的输出,而表意上阐述漩涡在文化领域的普遍现象说明单一的元语言评价体系不再可能。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6页。

② 赵毅衡、陆正兰:《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涡》,《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第5页。

新左派、新儒家等思潮影响着民众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这些不同社会思潮符号的意识形态性、复杂性程度并不相同。其中某些思潮对于现实问题提出不同于主流的方案,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诉求,但并非彻底否定与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在这些社会思潮的漩涡中进行及时且有效的解答,从而内化评价冲突,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力。现代性就是要克服单一评价体系的独断,使多态性成为全球化转型的必然条件。

三、解码:在元语言体系构建中自觉接受中国道路话语体系

党史文化的符号传播系统从编码者的意义生产到传播媒介的加工扩散再到受众的接受反馈,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理论框架。党史文化符号的传播策略性强、技巧性高,其时机、方法不同,效果也完全不同。国内外受众能否有效感知并体悟到党史文化符号中所传达的信息,与主创人员的编码能力、社会文化的语境影响、阐释主体的能力以及广大接收者的认知能力息息相关。其中,信息能够传递的关键在于解读符号意义的“密码集合”,即生产者与接收者双方的元语言体系是否产生交集与认同。实际上,表意过程的所有环节都在为党史文化符号的解码提供元语言,大致分为自携元语言、语境元语言与能力元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处理好元语言体系的问题,才能最终使传播者与受众在党史文化这一平台上产生有效互动,促使解码者接受并认同中国道路话语体系。

(一)创新党史文化符号的自携元语言,促进话语体系的创造性传播

党史文化符号中的自携元语言是普遍的,是指文本不仅作为被解释的对象存在,同时也在传达意义的环节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通过参与构筑解释自身所需的元语言集合,帮助解码最终完成。党史文化中自携元语言通常以伴随文本的形式展现,就党史文化生成的符号文本来说,文本标题、官方阐释以及民间评论作为伴随文本构成了自携元语言的主要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语义场,成为受众在解读党史文化中形成的一套固定符码思维模式。创新党史文化符号的自携元语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挖掘党史文化资源,发挥党史文化符号的创造性与创新性。党史文化符号本身是一个包含创造性与可能性的综合体,只有不断丰富与拓展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运用多维分析方法创新隐藏在党史文本之后、文本之外以及文本边缘的解释方式,才能以大历史观丰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内涵,进而发挥党史文化符号对于意识形态建构的积极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史文化的物质符号载体的保护利用。“文化本质上属于观念形态,是价值和意义,是内涵性的存在,不能目视,但文化可以通过物质载体对象化、客观化,从而为人们所感知、体悟、理解、接受。”^①党史文化的物质符号载体在提升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物质载体渲染党史记忆,使符号接收者深度感悟

① 杨耕:《文化的作用是什么》,《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4日,13版。

党史的深刻内涵,加深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增强党史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和内在的强大生命力。

(二)净化党史文化符号的语境元语言,增强话语体系的符号话语权

党史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不仅仅是符号文本的信息,同时在进行表意-解释行为的协调,形成表意解释的语境条件。从党史文化符号的解码角度而言,文本自携元语言并非意识形态构建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只是语境元语言的生成文本。携带着一定价值观念的党史文化符号通过人们的表意行为得到表达,并逐步积累形成党史文化的话语体系与文化面貌,进而控制或引导接收者的思想与实践。党史文化符号的使用情境极大地影响着接收者在党史文化中对信息的处理方式。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指文本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在外部意识形态语境充分的条件下,文本不完整也能靠语境完全得到理解,接受者能够调动语境元语言,在已定的语境中重构编码者的意图意义,这极大促进了意义社群的聚合、交流与互动。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处于一种中西交锋、互相抗衡的状态,这是意识形态的多样化造成的评价漩涡对我国的影响。因此,对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环境的净化,一个根本原则是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引领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的符号话语的主导权上没有让步的余地。党史文化符号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能够将主导的意识形态自然传输给受众,促使他们自觉阐释并认同,从而形成潜在的、与主导意识形态相符合的语境。

(三)提升党史文化符号的能力元语言,树立话语体系的符号自信

编码与解码是符号文本的自携元语言与阐释者的能力元语言在意义阐释的过程中实现的。自携元语言具有提示、引导阐释者按照文本意图进行意义解释的作用,而能力元语言则是阐释者在解释经验与情感信仰的基础上对符号文本的认知能力。党史文化的传播中蕴含着“虚”与“实”的辩证关系,“虚”是指传递真情,“实”是指传播党史,“虚”与“实”不是独立的、单独的,而是从相对的、辩证的意义上看待两者间的关系。对于阐释者而言,一方面要对相关党史文化符号进行分析与理解,提升党史文化的理论素质,另一方面要利用好党史文化中丰富的精神谱系,塑造自身的意志品格与行为倾向。这种“信仰”的能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能力,而是在潜意识层次起作用的能力,能够使阐释者维护其元语言有效性。人们对党史文化的理解是以一定的情感体验与认可为基础的,党史文化是充满真情、深情与感情的价值的感染与理论的熏陶。党史文化的魅力既靠知识入脑,又靠真情入心,阐释者要着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与历史文化素质,树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自信,真正做到以情化人、传播党史。

总之,文化符号在具体语境中产生,而话语体系则在符号演绎中变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中,我们从走自己的路的‘自主性’,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式’,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

‘理论建构’。”^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党史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其思想实质在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构筑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而只有阐释好党史文化中所反映的中国道路话语体系,才能进一步打造并构建具有穿透力的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标识性话语的中华文明观话语体系。

(作者:赵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肖爱华)

Encoding and Decoding: Construction of Party History Culture Symbols and Discourse Systems

ZHAO Yue

[Abstract] Party history culture, as a symbol, constitutes a powerful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emblem shap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over a century of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reformative, and self-constructive historical practices. The gener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arty history culture symbols are symbiotically intertw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s. In the mutual and parallel development within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coders" and "decoders", encompassing symbol encoding, propagation, and decoding, this process undergoes refinement and enhancement. Simultaneously, it reflects the role of the CPC as the encoder and interpreter of Party history culture symbol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nveying meaning, the Party overcomes interpretive and evaluative whirlpools, providing decoders with a metalinguistic framework capable of generating intersections and identities. This dynamic facilitates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ncoder and decoder on the platform of Party history culture, enabling the assertion of the Party's symbolic discourse authority. Consequently, it adva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Party in the cultural symbol domain.

[Keywords] Party history culture symbols; encoding; decoding; ideology; discourse system

^① 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哲学研究》2023年第8期,第21页。